

教育部“211”工程项目

新闻与传播 评论

JOURNALISM & COMMUNICATION REVIEW

主
办

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

武汉大学媒体发展研究中心

武汉大学“新闻传播与媒介化社会”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基地

2006~2007年卷

武汉出版社

WUHAN PUBLISHING HOUSE

教育部“211”工程项目

新闻与传播

评论

主
办

JOURNALISM & COMMUNICATION REVIEW

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

武汉大学媒体发展研究中心

武汉大学“新闻传播与媒介化社会”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基地

2006~2007年卷

武汉出版社

WUHAN PUBLISHING HOUSE

(鄂)新登字 08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新闻与传播评论(2006~2007年卷)/罗以澄,秦志希主编.

—武汉:武汉出版社,2007.12

ISBN 978-7-5430-3819-6

I. 新… II. ①罗…②秦… III. 新闻学:传播学-文集 IV. G210-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002060 号

书 名:新闻与传播评论(2006~2007年卷)

主 编:罗以澄 秦志希

责任编辑:明廷雄

封面设计:刘福珊

出 版:武汉出版社

社 址:武汉市江汉区新华下路 103 号 邮 编:430015

电 话:(027)85606403 85600625

<http://www.whcbs.com> E-mail:wuhanpress@126.com

印 刷:武汉中科兴业印务有限公司 经 销:新华书店

开 本:880mm×1230mm 1/16

印 张:14.75 字 数:410 千字 插 页:3

版 次:2007 年 12 月第 1 版 2007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0001-1000 册

定 价:28.00 元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

如有质量问题,由承印厂负责调换。

学术顾问

(以姓氏笔画为序)

丁淦林 方汉奇 甘惜分
何梓华 赵玉明

编委会成员

主任 罗以澄
副主任 许汉生
委员 石义彬 秦志希 单波
张金海 王瀚东 夏倩芳
周光明

特邀编委

(以姓氏笔画为序)

尹韵公 刘建明 李良荣
吴高福 陈力丹 张国良
胡正荣 郑保卫 童兵
黄升民 喻国明 樊凡

执行编辑

主编 罗以澄
秦志希(执行)
副主编 夏倩芳 周光明
责任编辑 刘娜

目 录

■ 新闻传播理论

- 理性的驾驭与拯救的幻灭:解读李普曼思想的价值与困局 单波 罗慧(1)
- 创新新闻学的概念辨析与理论溯源 石义彬 张卓(13)
- 新闻:真实性或者客观性
- 一种现象学路径的分析 张小元(19)
- 从本真生存到人神和谐
- 海德格尔传播思想探析 姜红(24)
- 传媒的权力
- 浅论若干西方著名学者关于“权力”的思考 刘娜(32)

■ 新闻传播史

- 关于中国古代新闻传播活动的几点看法 周光明(40)
- 1942 年河南大灾中的《大公报》 李卓钧 李国平(46)
- 英美广播电视制度差异探源 刘建明(51)

■ 媒介与文化

- 欲望的符号呈现、解读与生产
- 论德勒兹、艾柯与《玫瑰之名》 吴予敏 杜妍(58)
- 焦虑与反思:谁是新闻传播娱乐化、低俗化的操盘手
- 李岩 孙晓亚 殷畅 张川霞(66)
- 新闻传播中的“集体无意识”与神话再现 朱梓烨(84)

■ 中外媒体研究

- 《人民日报》(1996-2006)镜像下的美国国家形象建构 罗以澄 叶晓华 付玲(91)
- 突发事件让媒体发言
- 从危机传播管理看突发事件应对法第 57 条的修改 陈力丹 吴璟薇(104)

政治逻辑与经济逻辑交织中的法制新闻

- 1997-2006年中国新闻奖法制题材作品量化分析 夏琼 李洋(110)
- 电视媒介服务三农的途径及对策 薛涛 方晓红(120)
- 污染报道:《人民日报》与《楚天都市报》比较 王瀚东 周煜(125)
- 斯里兰卡公共广播机构:现实与问题 Pradeep Weerasinghe(138)

■ 网络传播研究

- 数字鸿沟、知识沟和政治参与 韦路 张明新(143)
- 中美政府网站评估体系比较研究 刘丽群 刘淑芬(156)

■ 广告传播研究

- 预设对广告语的有效传播分析 金星 陈培爱(164)
- 物质产品广告社会意义的特性探讨 张微(170)

■ 政治传播国际学术会议

- 意大利新闻法制初探 展江(175)
- 大众媒介与中国社会政治
——社会结构的视角 张金海 李小曼(181)
- 国家形象塑造和中国对非洲政策
——跨文化传播的视角 倪建平(187)
- 中国社会矛盾凸显期媒介政治传播功能的调适 冉华 王润珏(194)
- 美国公众对伊拉克战争的支持受到哪些因素的影响
..... Babak Babhador Scott Walker 林楠 编译(200)

■ 附录

- 作者简介 (209)
- 内容提要 (212)
- 征稿启事 (227)

CONTENTS

■ Theory of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 Rational Control and Disillusioned Salvation: Interpretation of the Values and Predicaments
of Lippmann's Theory in Mass Communication *Shan Bo Luo Hui*(1)
- The Concept and Theoretical Sources of the Innovation Journalism
..... *Shi Yibin Zhang Zhuo*(13)
- News: Authenticity or Objectivity *Zhang Xiaoyuan*(19)
- Discovery of Heidegger's Communication Thought *Jiang Hong*(24)
- Media Power: An Investigation of the "Media Power" in several Western Scholar's Theories
..... *Liu Na*(32)

■ History of News Communication

- Viewpoints of the Activities of Ancient China News Communication *Zhou Guangming*(40)
- 《Ta Kung Pao》in 1942's Big Drought of Henan *Li Zhuojun Li Guoping*(46)
- The Analysis of the Original Difference between British Broadcasting System and American
One *Liu Jianming*(51)

■ Media & Culture

- The Semiotic Presentation, Interpretation and Production of Desires
——On Deleuze, Eco and the Novel & Movie Name der Rose *Wu Yumin Du Yan*(58)
- Anxiety and Reflection: Who Is the Manipulator of the Entertainment Trend and Vulgarization
of News Communication *Li Yan Sun Xiaoya Yin Chang Zhang Chuanxia*(66)
- Collective Unconscious and Myth Resurgence in Mass *Zho Ziyi*(84)

■ Media in China and Foreign Countries

- Viewpoints of the United States Image in the Mirror of 《People's Daily》(1997 to 2006)
..... *Luo Yicheng Ye Xiaohua Fu Lin*(91)
- Emergency Requires the Statement of Media *Chen Lidan Wu Jinwei*(104)
- The Effects of the Political Will and Market Logic on Legal News
..... *Xia Qiong Li Yang*(110)
- The Tactics of the Television Media to Serve the Chinese Agriculture, Countryside and
Farmers *Shi Tao Fang Xiaohong*(120)

Reporting Pollution: In People's Daily and Chutian Metropolis Daily	<i>Wang Handong Zhou Yu</i> (125)
Realities and Issues of Public Service Broadcasting: The Case of Sri Lanka	<i>Pradeep Weerasinghe</i> (138)

■ Internet Communication

Digital Divide, Knowledge Gap, and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i>Wei Lu Zhang Mingxin</i> (143)
A Comparison Between The Assessment Systems of Government Websites In China And In The USA	<i>Liu Liqun Liu Shufen</i> (156)

■ Advertising

Analysis the Principle of Advertising Message from the Angle of Presupposition	<i>Jin Xing Chen Peiai</i> (164)
A Study of the Social Meaning of Advertisements of Material Production	<i>Zhang Wei</i> (170)

■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Political Communication

A Probe to Italian Legal System of Journalism	<i>Zhan Jiang</i> (175)
Mass Media and Chinese Politics: from the Angle of Social Structure	<i>Zhang Jinhai Li Xiaoman</i> (181)
China's Policy and National Image Projection in Africa: A Perspective on Cross-Cultural Communication	<i>Ni Jianping</i> (187)
The Function Adjustment of the Political Communication in the Period of Prominent Conflicts in Chinese Society	<i>Ran Hua Wang Runyu</i> (194)
What Factors Affect American Public Support for the Iraq War	<i>Babak Babhador Scott Walker</i> (200)

■ Appendix

About Authors	(209)
Abstract	(212)
Call for Papers	(227)

新闻传播理论

理性的驾驭与拯救的幻灭： 解读李普曼思想的价值与困局

□ 单波 罗慧

一般说来,李普曼常常被定义为一个政治自由主义者,但他的自由主义与自由放任主义尖锐对立,更多地表现出对社会权威和政治秩序的依恋,他的精英主义民主论以及对民众理性能力的怀疑,都是这种依恋的结果。而在依恋的背后,有着理性主义思想的支撑。他试图运用理性解决现实的需要、问题或危机,相信人类可以用理性来控制、设计、监视社会和政治生活的一切方面,建构良好的政治秩序。西方传媒的理性控制思想也因此生发出来。

在柏拉图的《菲德罗篇》中,有一个关于灵魂的著名神话:理性作为双轮马拉战车的驾驭者,抓住白色骏马和黑色骏马的缰绳,白色骏马代表人的勇猛或情感部分,对理性的命令较为驯服,黑色的骏马难以驾驭,代表着欲望或情欲,必须受驭手鞭挞才肯循规蹈矩。在这里,理性意识从人的身上分化出来,成了一种拯救人的精神力量。而在《理想国》的另一个神话里,人类的实际状况非常可怕:人坐在洞穴的暗处,上着镣铐,他们背向阳光,只看到投射到他们面前墙壁上的物体的阴影。有个囚犯获得了自由,转过身来看到了他先前只能看见其阴影的物体,以及造成阴影的光本身,甚至可以继续走到洞口,看到外面的太阳。柏拉图以此寓意人走向理性的命运转换,亦即从黑暗到光明,从无知到有知,从遭受遗弃到获得拯救的进步。可以说,在人类罪恶不断上演、资本主义矛盾层出不穷的二十世纪,李普曼扮演了“理性的驭手”角色,试图拯救民主、社会、新闻与公众,然而拯救的愿望最终落空了,不得不以对社会权威和政治秩序的依恋作为了结。因此,从理性主义角度重新审视李普曼思想的价值与困局成为一种很重要的研究路径。

一、理性的驾驭:使民主秩序具备科学的精神

在1913年出版《政治序论》之前,李普曼在理性主义与反理性主义之间已摇摆多时。威廉·詹姆斯(William James)赞颂直觉和实验、反对教条和抽象的唯理智论使年轻的李普曼浮想联翩,而乔治·桑塔亚纳(George Santayana)担心过分的民主会导致大众的暴政,强调“理性的功能是驾驭经验”^①,这又使李普曼“确定了为尽善尽美而奋斗的信念,并把它作为由理性主宰的生活的最高目标”^②。弗洛伊德(Freud)、伯格森(Henri Bergson)、尼采(Friedrich Nietzsche)、索莱尔(Georges Sorel)等人的思想证实了李普曼对19世纪唯理论的的不信任感和质疑感。格雷厄姆·沃拉斯(Graham Wallas)主张把政治学与心理学联系起来,认为“人们作出的

政治上的判断,不是基于明智地权衡事实以及可能的后果,而是和他们作出其他判断一样,是通过本能、偏见和习惯作出的”^③,这种将人性及公众的心理问题纳入政治学研究范畴的思路又深深影响了李普曼。到写作《政治序论》(A Preface to Politics, 1913)时,思想的天平似乎暂时倒向了反理性主义。

原因何在?从总体上讲,在当时的美国,到处可见经济和政治权力集中化和固定化的现象——无论是华尔街银行家们的小型董事会和公司主管们手中的权力,还是由政治机器操纵的民主制度,或者是刚刚在工作场所出现的等级控制,甚至包括像《独立》这样面向全国发行的周刊本身所具有的左右民意的能力等,这一切都使美国人分享了对于作为理性主义化身的官僚政治的恐惧:即官僚政治试图对社会生活进行理性的控制与安排,支配人们的生活,腐蚀个人主义的基础和自由的理想。针对这种情况,当时的进步主义者确定的目标是通过增加平等的内容而使资本主义人性化,通过把政治权力归还给全体公民、把公民和谐归还给分裂的社会,从而使民主重新焕发活力^④。在李普曼看来,要改变现状,就必须反叛传统制度所谓的理性控制与安排,探寻创建新政治的路径,人们不应当为传统制度与社会习俗所束缚,而是要成为能运用想象力塑造环境的革新者。为此,李普曼突出了人性在政治生活中的地位,亦即人的自发性、欲望、自由自在对于政治创新的作用。在《政治序论》中,他在沿袭旧例的常规者和发明者之间作出了区分,认为常规者应当承认每一个强烈的欲望都有某种文明的印记,但他却运用“禁忌的专制来窒息欲望的动力”,常规者通常不是将欲望导向正确的方向发展,而是禁止欲望本身,无论何时,当面对人们表达强烈要求改变的愿望时,“常规者处于惊恐状态,所以求助于禁忌”^⑤。很明显,李普曼反叛的是保守的理性主义,理由在于它抑制了政治创新的动力——人的欲望和自由天性。但真正说来,成为李普曼靶子的,与其说是理性主义,倒不如说是存在于各种常规、禁忌中的“抽象性”,正是这种“抽象性”使人看不到实在的生活、实在的需要,沦为政治的“囚徒”。

然而,书中流露的反智主义倾向,显得批判性有余,而建设性不足,无法通向进步主义所设定的目标,也无助于克服民主政治的危机,因为这难免走向另一个极端:在动荡不安的现实面前随波逐流,忽视人自身的理性能力,被动接受生活安排的一切。李普曼逐渐意识到,无论是保守主义者也好,还是无政府主义者也好,其共同点都在于没有找到真正应对现实的正确途径,这就如同在与希腊神话中的九头怪蛇搏杀时,没有直接攻击它的要害,而是一味地砍杀它的头,可是,保守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都忘记了,九头怪蛇的头永远也砍不完。因此,面对这两类不同的放任形态,要想在这个复杂的社会中求得生存,解决问题的根本方法在于:学会驾驭。这样,便有了1914出版的《放任与驾驭》(Drift and Mastery, 1914)。

虽然在这本书里李普曼依然坚持认为,任何可行的政治理论必须面对人的非理性,要抛弃传统理性主义的偏见,但他已从伯格森的生命之流转向科学的方法,不再指望人的直觉本能或创造性的神话,而是求助于科学。为了真正在这个动荡的现实中找到一种确定感,人们应该动用自我理性对生活中的一系列问题进行反思,“反省我们在生活舞台上扮演的角色,仔细审视我们自身和外部的世界,找到隐匿于意识自觉性背后的动力”^⑥。因此,驾驭意味着“让理智进入我们的无意识生活”,“以明确的意向取代无意识追求”^⑦,使民主秩序具备科学的精神。在他看来,“放任”意味着国家和社会将继续奉行已过时的个人自主而运作,保守主义者将继续沉溺于回忆与被动接受现状的态度之中,无政府主义者也将长久陷入无明确目标的激进行动及理论与实践的割裂之中;“驾驭”则明确表明要对社会问题和冲突进行科学理性的探索,并运用这种科学理性的精神重塑国家和社会。为什么要通过科学来实现驾驭呢?按照他的逻辑,科学精神就是民主的内在规定,意味着“采取行动不是缘于一时的兴致或刻守一种禁忌,而是明确认识到:什么是可能的,生活的可能性是什么”;而有了科学的指导,“人们就可以从放任中脱身而出,将事实与想象区分开来,弄清楚真正可能实现的梦想是什么”^⑧。

由此,李普曼为解决美国的民主危机指出了科学的理想主义方向,它不再激进,也不再保守,不再放任非理性的泛滥,也不回避人的非理性,不屈从于各种常规、禁忌,而是遵从事实与真相,开放人的主体意识。在这里,驾驭意味着每个人运用科学与科学精神以有明确目标意识自觉性取代无意识追求。为了避免理性的“抽象性”,李普曼将驾驭的概念运用到商人、工人、妇女、国家等各种不同角色上,认为对商人而言,意味着驾驭自己投机赢取暴利的动机;对工人而言,意味着以有目标的运动取代盲目的暴力反叛行为;对妇女而言,意味着将科学更深更广泛地运用于有组织的家庭生活之中;对国家而言,意味着政府权力的扩大。

表面上看,李普曼似乎为诊治美国社会的混乱开了一剂适度的理想主义药方,但他还是没有摆脱理性主义的局限,即过分专注于确定性,将知识等同于技术,从而让理性嬗变为技术理性,免不了使人落入某种控制体系。他不仅关注事实的确定性、生活的确定性,而且考虑意识的确定性、实现梦想的确定性,而科学似乎是唯一满足确定性标准的那种方法。在这里,至少有两方面的问题被他忽略了:一是既然科学可以被制定为规则、原则、准则之类的东西,那么,理性就免不了落入对人的抽象规定;二是当不确定成为人的一种普遍存在状态的时候,普通人的理性能力就成了值得怀疑的事情,而在理性主义的出口处,就只剩下少数精英替我们把握社会生活的确定性了。这便演绎出了他在新闻与公众舆论观上的矛盾。

二、《自由与新闻》:营造理性生活的环境

一战期间,曾在美国情报调查局供职的李普曼深深体验到,在“国家利益”的感召与强制性的新闻检查之下,新闻界充斥着宣传、欺骗与谎言,尤其在巴黎和会的报道现场,记者们为一些支离破碎的新闻你争我抢,互相交换一些谣言,然后把这些东西倾注到报纸杂志的头版发表,甚至那些经验丰富的记者在这些谣传谎言、走漏风声和捕风捉影的迷宫中也茫然不知所措。新闻审查和宣传使人们难以区分究竟什么是事实,什么是谣言,“传统的言论自由和意见自由没有建立在一个牢固的根基之上”^⑨。同时他还意识到,自从约翰·亚当斯(John Adams)以来,还未曾见过执政者对宪法规定的自由进行如此执意而异常危险的进攻,如对异己分子不经审讯就加以驱逐,对政治犯进行残酷判处,严格实行一战以来的新闻审查制度等等,凡此种种,都构成了一种“恐怖的君主统治,在这种统治之下,不允许有诚实正直的思想,不支持温和节制的做法,疯狂取代了理性,政府不但设法缓解人们的慌乱,反而集人类之能事,对一个已经抽了风的社会火上浇油”^⑩。

1920年春,李普曼在给《大西洋月刊》(The Atlantic Monthly)的编辑埃勒里·塞奇维克的信中写道:“我发现舆论是可以被左右的,因此我决定写一篇长文,全面地探讨一下在新的情况下,思想和言论自由是如何表现自己的,以及由此产生的新的问题。我的这一想法是逐步形成的,这是因为我和官方的宣传机器打过一些交道,也是由于我试图重新阐述一下,在由政府进行统治这种现代社会条件下,和在具备了如何操纵人们头脑这种现代知识的情况下,思想自由这一问题又是如何表现自己的”^⑪。于是,便有了1920出版的《自由与新闻》(Liberty and the News, 1920)。

李普曼没有从书本出发进行自由原则的抽象论证,而是琢磨一个现实问题:在20世纪初的美国民主社会中,报刊已取得自由的合法性,但仍不能履行其职责,这是为什么呢?他给出的答案是,这是因为在当时不存在报刊自由赖以生存的基石——真实的事实。同时,面对以谎言和欺骗为业的新闻界,他提出质疑:“当意见的自由显现成为错误的自由、幻觉的自由和曲解的自由,那么这种自由几乎不可能激发出比自由本身所代表的更大利益,这种意见的自由是完全抽象化的自由,是对主智主义思想的过度改良。”^⑫为了唤起人们对事实这一新闻实体的感悟,李普曼在《自由与新闻》一书中试图阐释三个疑问:新闻最高级的法律准则是什么?现

代自由意味着什么?如何拯救自由的危机?

根据霍尔姆斯大法官(Justice Holmes)的宪法理论“事实是人们愿望赖以实现的唯一根基”,李普曼做出判断:“只要那些提供新闻的人将自己的信念解释为比事实更高级的法律,那么他们就是在攻击我们宪法体系的根基。在新闻工作中,没有比告知真相与羞辱恶人更高级的法律准则了”^⑧。当然,归纳出新闻的高级法的确是一个认识上的突破,但一战前后的美国报刊是否遵从了这条准则呢?当然没有。于是,李普曼进而认定:当前西方的民主危机在于新闻业的危机,说得再确切些,现代民主的危机在于新闻业中事实的匮乏。

事实为什么会匮乏?美国的第一宪法修正案(The First Amendment)不是已经为报刊自由的合法性提供法律保障了吗?在李普曼看来,“自由的学说在严峻的考验下无一例外不成为其他理念的附属品。自由从来都不是目的,而是为实现其他目的的手段”^⑨。既然如此,那现代自由的真正意蕴究竟为何?

其一,自由不是指宽容弥尔顿提出的所谓“无关紧要的差异”。这个概念是弥尔顿为自由申辩的核心要点,他希望自由意见的获允范围包括某些新教教派之间的“和谐差异”,只要这些“和谐差异”对行为和道德没有真正的影响。于是,弥尔顿得出结论:某些教义间的冲突因为不重要所以可以宽容。以这种逻辑推而广之即意为:当人类不感到害怕时,他们就不害怕意见;反之,当他们没有安全感而感到恐惧时,他们就会惧怕任何看上去似乎是煽动性的言论或事物。在李普曼看来,在一个公众舆论具有决定权的社会中,意见形成中有价值的要素没有哪一个可能真正是无关紧要的差异,当社会意见很敏感且具有决定意义时,这种对自由的宽容标准就不起作用了,因此,“‘无关紧要的差异’概念作为自由的传统核心是一个如此缺乏活力且不真实的原则,以至于它无法保护自由的目的所在,自由的目标在于营造健康的环境,在这个环境中,人们可以通过判断和质问成功地组织人类的生活”^⑩。也就是说,自由的目标是营造理性生活的环境。

其二,自由也不意味着“当发表意见的情况足以使意见的发表成为指向某种伤害的积极煽动时,也要失去其特权”^⑪。密尔为自由争辩的理论前提是,当社会禁令下的大多数意见对社会并没有利害冲突时,不应该对这些意见加以阻挠,但如果意见会直接影响社会秩序时,个人的自由就应当被限制,因为他不能使自己因干扰到其他人而成为一种他人眼中的麻烦。事实上,密尔对自由界限的规定却常常成为了社会压制自由的借口。

虽然李普曼的自由思想同弥尔顿和密尔所倡导的自由精神有一脉相承之处,但对于两位前人论证的观点和逻辑,他却仍有保留。在他看来,他们对于自由的争论只是将自由作为手段而非目的,所以几乎很少切实关注到自由本身的存在问题。因此,一战期间人们看到了自由的另一种畸变:在战争的特殊时期,许多报道在“爱国主义”口号的感召下充斥着谎言,公众无法了解事实的真相,在这里,自由成为了撒谎的自由,成为了为实现特定宣传目的的工具,是印证“目的使手段合理”的又一桩个案。

除了将自由作为手段外,还有其他原因导致人们无法了解事实的真相,如记者个人能力的有限性,战时的新闻审查制度削弱了真实的可能性与全面性,新闻编辑的程式化处理。真相经历重重关卡后,造就了这样一种现实:公众失去了与客观事实之间的联系。当我们失去意见自由赖以存在的事实依据后,自由被架空了,成为了虚无的自由。如何来拯救自由呢?李普曼认为,必须转移自由争辩的方向,“我们不可能通过颁布一系列许可令和禁令来成功地界定自由或成功地实现自由,因为这种做法有利于意见的形式而忽略了意见的内容。最重要原因是,这种做法是试图从意见的角度来界定意见的自由,这是一种循环且缺乏想象力的逻辑。只有在人类生活的主要事务中搜寻自由的原则,才能获得一种有用的关于自由的定义。也就是说,自由是在人们培养自我的反应力并且学习控制周遭环境的过程中获得。在这种观点中,我们要采取措施以保护和增加采取行动所依据的信息的真实性,这些保护和增加信息真实性的措施

就叫做自由。”^⑧显然,李普曼是把真实性当作民主政治的确定性来加以维护的。

为了实现这种自由,李普曼认为,必须将报纸行业从一个随意的商业转变为一个规范的职业,并下决心为社会输送一批真正的新闻人才,他们不是仅仅会挖掘新闻的聪明人,而是有耐心、无惧怕的理性人,可以通过详细分析来探究世界究竟是什么。但是,新闻的规范与人才的理性还不是问题的关键,尤其是在报道政治新闻方面,即使“那些财产最富有、资源最丰富的报纸在努力报道‘华盛顿’新闻方面并不成功,人们注意到社会的焦点、争论及轰动的事件,但是无人能通过阅读每天的新闻报道使自己知晓关于国会议员或政府各个部门的信息”^⑨,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之一就在于行政机构权力的集中程度远甚于国会,这种情况已超出传统代议制理论为双方规划的权力比例范围,虽然行政机构是政治新闻真正的消息源,但报道行政机构比报道国会难得多。基于对现实困难的认知,两项有趣的实验产生了,一个是建立或多或少带有半官方性质的政府研究机构,另一个是增加专业的私人机构,以期为政府各部门的工作进行一个技术性的总结。听很想好像很复杂,可实际上这两项实验的原则很简单,它们就像有组织的内行记者一样,集中精力致力于三项任务,即:做当下的记录,做一个连续性的分析,以及在以上两方面的工作基础上提出计划。具备了这样一种观察政治和获知政治新闻的才智,记者就不再是威廉·詹姆斯(William James)笔下那个需要通过自己在墙壁的裂缝中慢慢攀爬来摸清房屋构架的蚂蚁了。

总之,在李普曼看来,新闻业的拯救在于两件事情:“最根本的目标是,将具有新观点和受过新训练的人才注入新闻机构之中;当下的目标是,集中独立自主的社会力量以反抗新闻机构中墨守工作常规人士自满与糟糕的服务。当我们学会谦卑,当我们学会寻找真相、揭示真相、发表真相,当真相与不确定迷惑中的争辩特权相比,我们更关心真相时,我们将会取得进步”^⑩。

综上所述,李普曼为我们构筑了这样一幅自由的全景:新闻自由的高级法原则是告知事实与羞辱恶人,但是囿于传统的通过划分自由与许可之间的界限来规范自由的方式,人们只注重了自由的形式而忽视了自由的内容,自由有时甚至沦为“目的使手段合理”的范本,因此,李普曼认为真正的自由在于保护消息来源,以确保公众能自由接近事实真相,为此,培养专业的记者队伍,并将报纸行业从一个随意的商业转变成为一个规范的职业,是拯救新闻自由的必经之路。

传统民主理论的前提是假设公众具有理性认知的头脑,但没有考虑到舆论的力量,故而现实民主的危机在于以歪曲事实来左右舆论。在这本小册子中,李普曼设想的解决方法并未脱离传统民主理论的思维取向,仍然认可公众的理性,但前提是必须确保能源源不断获知准确、真实的消息。

三、公众舆论危机的求解:诉诸理性

当李普曼追本溯源,将民主的危机归根于人类自身无法改变的能力局限性时,李普曼信奉的传统民主理论走进了死胡同。想突破,要么退步三尺,重新探寻原因;要么继续向前,把胡同走到底,然后纵身一跃或凿墙钻洞,进入另一种路径。面对两条道路,李普曼选择了后者,即穿透传统民主理论观,奉行现实主义民主观。

在《自由与新闻》中,李普曼认为公众舆论大体上不是对事实的反映,而是对存在于外部世界与公众之间的“拟态环境”(pseudo-environment)的反映,因此,他强烈谴责“那些未经分析的文字所具有的欺骗性”^⑪。在当时,李普曼认为公众之所以不能正确认知事实,是因为新闻界没有提供真实的信息。但随后,李普曼又进一步产生疑惑:如果问题不仅仅是由新闻报道和政府干预所致,而是公众在其形成舆论方式的性质方面出现问题,那又是怎样一种情形呢?顺

着这条思路,1922年他完成了《公众舆论》(Public Opinion, 1922),进而在1925年出版了《幻影般的公众》(The Phantom Public, 1925)。

受沃拉斯《伟大社会》的影响,李普曼认识到现实世界太大且变幻莫测,人们难以全面了解世界发生的事情,再加上官方设置的审查制度和保密制度的存在,事实本身也欠缺全面和充分,“根本就不存在值得信赖的新闻报道,而且也无须指望以后的报纸会出现令人信服的报道”^④。鉴于此,人们对事务形成的判断要么建立在有限的信息上,要么建立在报界提供的和自己想象的“拟态环境”之中。文章一开头,李普曼便以柏拉图的洞穴理论相类比,认为处于“拟态环境”中的现代公民没有时间也没有精力思考纷繁的世界事务并做出明智的判断,他们只能充当“局外人”。

在这里,李普曼不经意间呈现了理性的悖论:在现代社会,人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生活都得到理性安排,但是,理性的无限僭越和滥用,又使生活抽象化、片面化,使人不得不遭遇“拟态环境”,在自己的社会里成为局外人^⑤。在李普曼看来,人对世界的认识受挫于“刻板成见”,“大多数情况下我们并不是先理解后定义,而是先定义后理解。置身于庞杂喧闹的外部世界,我们一眼就能认出早已为我们定义好的自己的文化,而我们也倾向于按照我们的文化所给定的、我们熟悉的方式去理解”^⑥。而且,他也看到理性遭遇了非理性的挑战,大部分人对世界的认识是通过他们的感情、习惯和偏见这个三棱镜的反射而得到的,因而总是容易混淆事实与虚构之间的界线,更为重要的是,“不加批判地固守成见,不仅会无视许多需要考虑的东西,而且一旦因此遭受报应,成见土崩瓦解,那么明智的考虑很可能会和它一起毁灭”^⑦。

然而,李普曼并未反思理性自身的局限性,而是赋予理性某种怀疑的、超越的性质,即理性就是要用怀疑的、批判的精神面对成见,面对事实,就是超越个人利益面对全局利益。由此观之,一般的公众是缺乏理性能力的,所谓的理性自治只是一个幻想。那么,谁有理性能力管理国家和社会呢?在李普曼眼中,这个任务非专家型社会精英莫属。一般的公众不可能独自面对外部世界,而是面对一系列的自我。社会角色的多元化决定了个人自我类型的多元化,只注重个人利益的普通公民既不了解情况,又无理智,只能是“局外人”。只有属于“社会贤能”的少数“局内人”能着眼于全局利益,在受过特殊训练后,可以通过专门的“情报机构”得到信息从而做出明智的判断,并能以宣传左右“局外人”的意见走向。

但人们会疑惑,作为专家的知识分子是否能真正独立于“行为”人呢?尽管作为专家的知识分子不是某一党派人士,但是,他可以在其能力范围内使自己的意识形态与专业技能相分离吗?当他的利益取决于行为”人时,他有能力使自己摆脱所有党派偏见的印记吗?知识分子能豁免于一般的罪恶本性(如自私)难道不是自欺欺人吗?这些问题很难在李普曼那里得到自圆其说的解释,但我们可以看到他的一个非常明晰的思维:在民主政治和公众舆论因失之于理性而发生危机之际,拯救之道还在于诉诸理性。虽然他在《公众舆论》的最后一章非常勉强地写下“诉诸理性”的结论,而且意识到以理性的方式对付非理性思维的世界,要么因太绝对、太僵硬而使人难以遵从,要么落入空谈和幻想而派不上用场,但他还是认为应该在某种直觉中树立对理性的信念,用我们的智慧和力量为理性开辟一席之地,原因在于,危机虽然巨大,却不是无所不在,“有腐败,也有廉洁。有混乱,也有奇迹。有弥天大谎,也有人在决心揭露谎言”,人可以对社会生活的很多方面感到绝望,但“不能对人类已经表现出的品德所带来的前景感到绝望”^⑧。他所说的“社会贤能”、“局内人”在某种意义上集中了人类的品德,是理性与良知的代表。诉诸理性就是寄希望于他们在专业主义氛围下,以科学的方式思考问题、管理社会,为民主政治导航。

于是,不知不觉中,李普曼放大了理性的功能。他在《公众舆论》的导论中提出了一个理论假设:“如果我们能准确再现我们脑海外的世界,那么我们就能准确再现这个世界”^⑨,因此,知识的本性在于大脑能够建构再现。究竟哪些属于再现领域呢?李普曼按再现程度将所有文

化划分为三块:能很好的再现现实的领域(如科学),不那么擅长再现现实的领域(如艺术),根本无法再现现实的领域(如新闻)。李普曼认为,“现实是‘可以用图像呈现的’,真相可以通过独立而客观的、图像化的现实,而不是用与现实相对应的评议来表现。但新闻不能像图像一样呈现现实或提供相应的真相,就像雷达扫描时的光点,新闻只能提供一种信号,表示有些事正在发生。它更多地提供有伤风化的照片与刻板成见的伪现实。只有当现实简约为统计报表,新闻才大致是真实的”^②。这种表述实在绝对,以至于从“劣根性”上否定了新闻业存在的意义。更要命的是,理性被绝对化以后,对公众的理性能力的怀疑越来越深重了。

《公众舆论》完成后,李普曼毅然离开令他压抑的《新共和》而来到普利策的《纽约世界报》(The New York World)。由于李普曼在《纽约世界报》面对的读者数量是《新共和》(The New Republic)的十倍之多,他对大众的暴虐更加恐惧,于是一边给《纽约世界报》写社论,一边埋头撰写《幻影般的公众》,他力图阐明,假如舆论本身在知识和精神质量方面没有任何改进的话,舆论会起什么作用?怎样做才能更为行之有效呢?

在《幻影般的公众》中,李普曼对公众理性能力的怀疑到达极致,让他难以相信的不只是普通公众能否治理国家,而是认为“公众”这个群体好像实际上并不存在,我们所称的“公众”只是一个“幻影”^③:

因为当个人在政治上度过了浪漫主义时期,就不再为了陈腐的狂热的口号而激动,当他清醒不再激动时,他在公共事务中的角色对他来说显得那样虚假、平庸和微不足道。于是你不能直接以公民责任、奉献之类的话打动他,在他面前挥动国旗或是派一名童子军紧跟其后让他表决也无济于事。他是一个从战场上回来的人,为了使这个世界变得与以前不同变得更加美好;他被整个事件的泡沫戏弄了,看透了其中的空话。

这是时事使然,亦是理性主义的内在逻辑。当理性主义被推至极致时,它会进入两个相反的方向:一是形而上学的方向,即试图用一种纯理性的因素,来说明那稳定内在的结构;二是引出激烈的怀疑主义或相对主义^④。此时李普曼所诉诸的理性便完全进入了后一种方向。

既然无法改变公众天生的能力缺陷,并且也无法通过改变生存环境来影响公众,那么人们究竟能对幻影般的公众做些什么呢?在此前的《公众舆论》中,李普曼提出建立一个专业的事实查证机构,以向公众传递真实、准确的信息,但是在续篇中,李普曼却认为专业的事实查证机构已毫无用处,因为这些事实查证机构只能偶尔给予普通公众一些微小的帮助,调查结果对一般读者来说太复杂,而且大多数结果的意义并不大。但是,这并不是说专业调查机构完全失去了价值,只是说它的价值对象从公众转向了各式各样的专业服务机构,通过向它们提供情报,以帮助社会精英在一定程度上实现国家管理。

当然,李普曼并未完全放逐公众的自主决定的权力,而是为公众确定了一种在他看来再合适不过的角色——精英的贤内助,即通过遵循“程序主义”以确保统治者对特定程序担负责任。这种角色使公众不再是传统民主理论中的自由意见主体,而成为现代民主理论中的外围主体,外围于社会精英,他的权力在很大程度上只意味着在“同意”与“不同意”之间做出选择。李普曼认为唯有如此,才能解构公众的非理性,“摆脱那帮懵懵懂懂的乌合之众造成的暴虐和喧嚣,而得以自由自在地生活。”^⑤顺此思路,他又把公众舆论的作用简化到一个十分保守的地步,即其作用仅仅是“在问题出现危急之际使人民团结起来支持那些有能力解决危机的人”。可是,对于一个太过无知以至于无力对实质性事务进行判断的公众来说,他又如何有能力理解程序方面的事情以至于确保统治者按程序办事呢?《幻影般的公众》没有对这个问题做出清楚的回答。但我们可以体会到,李普曼对公众理性的怀疑来自于对大众的暴虐和喧嚣的强烈

反思,而且这种反思越是加深,这种疑惑总是越要加剧。

与此同时,李普曼进一步陷入相对主义,他通过无情地鞭挞进步主义视“公众”为单一政治集合体的概念,把公众想象为具有多元价值的组合体,由此创立了后进步主义时期新的理念:政治是一个“现实主义”的代理过程,代理公开的以利益为基础的多元主义,这种政治中公共利益不再有那么高的地位。

引人注目的是,李普曼对公众理智能力的逐级否定使美国的自由问题发生了转向。美国曾流行这样的看法,“如果人是自由的,那么他们将拥有完善的信息;如果信息是完善的,那么他们可以理智地选择最有效的手段来达到个人的目的,如此一来,在人的行为上,就会产生社会善行”,因此,美国的“新闻工作者关心的问题就是如何确保自由的环境,以对抗破坏势力,那些势力被认为是政治的和机构的,而不是心理的。一旦拥有对抗这些势力的自由,真理与社会进步就能得到保障”^④。然而,李普曼认为,“自由的传播系统并不能确保信息的完善,即使在自由的条件下,也不能确保事物的真相;自由的敌人如今不再是国家和不完善的市场,而是新闻和新闻采集的本质、受众的心理以及现代社会的规模”^⑤。值得注意的是,李普曼在此将自由的诠释从道德、政治的权力角度转向了认识论本身,将大众媒介的讨论基础从公众、权力、自由转向知识、真相及刻板成见,这种转变严重低估了国家与阶级权力所扮演的角色,容易导致公共领域的“去政治化”。

20世纪20年代,美国的现实主义民主理论正处于巅峰时期,信仰者认为非理性的无知大众是当今社会稳定的心腹大患,普通人不能够积极参与对自己生活的决策,决策的权力必须由精英执掌,因为只有精英才具备有效统治的知识和技能,群众可以定期参加选举,由此决定是否让同一批精英继续执掌统治他们的权力,民主社会只需要让群众享有有限的民主参与权,就能保持民主的正常有效的运作。而信奉传统民主理论的杜威却认为,世界受害于领袖和权威远比受害于群众为烈,只有在原民主基础上更为民主,才能真正拯救民主,而现实民主存在的问题“与其说是大众民主,还不如说是伟大社会本身”^⑥。杜威力图让人们明白,大多数人类渴望参与影响他们生活的决定;而李普曼则得出结论,无论怎样激励大众,他们大体并不想深深陷入政治之中。事实上,杜威也承认,李普曼对大众冷漠态度的剖析的确是现实的反映,但是,他并没有像李普曼那样因为存在问题就将大众直接打入冷宫,而是认为成熟的理性公众还未真正形成,进而得出结论,“民主系于未来而非当下,当公众变得理性,当社区不再是人工合成的结果,民主就会形成”^⑦。

进一步探究发现,杜威和李普曼不仅在对公民素质高低及民主实现路径方面持不同意见,对人的根本生存价值也存在不同理解。在杜威看来,自治是个人目的、群体目的的和谐交融与实现,是人存在最根本的利益。但在李普曼这样的民主现实主义者看来,自治只是人的众多需要中的一种,而且还不一定是最重要的。人类关心各种各样的事情,如秩序、权力、富足、声色之乐、新奇变化等等,人并不为自治本身而求自治,人求自治是为其结果。因此,用来衡量政治的尺度不应该是公民们的自治程度,而应该是能否保证某种最低程度的健康、好的住房、物质需要、教育、自由、快乐和美。李普曼认为,在现代工业化民主社会中,自治只不过是一种需要扩展的次要的利益而已。可是,从怀疑公众的理性,到取消公众的理性,公众的利益如何保证?失去了理性的公众如何被拯救?诉诸专家理性对失去理性的公众还有可能性吗?这一切都成了政治理性主义的悖论。李普曼提升了人们对公众舆论和民主政治的反思力度,却还是没有找到拯救之道。

四、理论的盲点、拯救的幻灭及超越之道

按照李普曼的观点,谁都难免有盲点,这是刻板成见造成的结果。这句话用在他自己的身

上也非常合适。通过上面的分析,我们可以做一总结,其根本性的理论盲点在于:夸大公众理性能力的缺失,同时又忽视理性自身的内在局限,从而陷入由科学所导引的技术理性的幻觉。对于人的理性,康德早就有过深刻的揭示^⑤:

人类理性具有此种特殊命运,即在其所有知识的一个门类中,为种种问题所困,此等问题因由其理性自身的本质所规定,故不能置之不顾,但又因其超越理性所有之一切能力,故又不能解答之也。

说白了,就是一方面人的理性本能有一种冲动要对宇宙做纯粹的理性说明,但另一方面,人的理性技能又不足以满足此种冲动。在康德看来,摆脱此种矛盾问题的唯一方式就是,理解和承认人的理性的内在局限,给出其限度,从而将人的理智能力限定在其规定范围之内。虽然李普曼也意识到理性有时使人陷入绝对、僵硬或者空谈、幻想,对公众的理性缺失也有深入的分析,甚至也想突破传统理性主义对人的欲望与自由天性的抑制,及其为人所设置的常规与禁忌,让人们面对事实与真相,依稀呈现出存在地感知社会生活的路径,以及灵动的、适度的理性主义的可能性,但可惜的是,他把理性与人剥离开来,一般人因感情、习惯和偏见的左右而远离理性,而少数“社会贤能”之所以能获得“理性”,是因为他们能遵从理性的规则,着眼于全局利益和科学方法。这样一来,自然形成了对公众理性认知能力的消极否定,以及“局内人”与“局外人”的成见,从而消解了公众与少数“社会贤能”作为理性主体与传播主体的平等权力;在取消公众的理性主体后,民主危机的拯救几乎成了一句空话,因为公众已经没有理性能力与少数“社会贤能”沟通了,也没有理性能力对公共事务发表见解了。当他转而把目光投向情报机构的建构,试图让理性与道德精神照亮民主的现实时,公众舆论运行过程中权力关系的复杂性与多样性又被严重简化了,到头来,公众舆论受制于权力的难言之隐依然挥之不去;同时,李普曼由对公众的怀疑到对公共利益的否定,再转向绝对的“公正无私”式的道德幻想,最终也抛弃了公众意义分享过程中的公共意识建构。所有这些,都使其诉诸理性的驾驭拯救民主危机的愿望几乎落空。

写完《幻影般的公众》之后,李普曼马上意识到,从人种、社交或宗教方面来看,美国已不再是一个同质性的社会,稳定世界已被打碎,要想灌输一个共同的信仰,如果不是不可能的也是相当困难的事。于是,原先整齐划一的信仰被怀疑所取代,然而,怀疑主义虽与科学精神气质相近,却对既定的权威造成了严重的破坏,如美国生活中世俗化的趋势、家庭关系的松动以及传统权威衰落等等,这些都并未像早期的反叛者想象的那样会带来解放,相反,它造成全社会信仰的虚无,到处弥漫着的不愉快气氛使人们茫然若失。因此,李普曼开始写作《道德序论》(A Preface to Morals, 1929),从伦理学角度出发,探讨现代世界道德权威的衰落,思考西方发达工业国家面临的共同问题:“大多数公众不相信任何既定的和权威的信仰”^⑥。也就是说,他开始思考精英式民主所面对的基本现实问题。

人们为什么从根本上拒绝信仰呢?李普曼总结了三个方面的原因。首先,应归结为美国的自由传统。“美国的社会制度是变动的、革命的、新教徒的。它没有确定的领导人和明确的行为标准,也无人被认定为道德的阐释者和喜好的仲裁者。在这儿,没有社会等级制度,没有公认的统治阶级,没有众所周知的权利和义务的体系,没有行为方式的准则”^⑦。其次,城市化的进程破坏了乡村生活的安定感,都市成为暂时居住、漂泊无根的代码,信仰更可能存在于乡村的平静生活之中,现代化的进程只能是信仰的终结者。再次,社会角色的多元化加快了道德确定性的瓦解。具体而言,一个主体可以同时扮演两种角色,如债权人和债务人,买家和卖家,父亲和士兵,雇主和雇员,贸易联合会官员和政治家等,自我利益的多元化使他不可能只忠实于任何个人或任何机构,于是民主党人和共和党人同属于一个国家俱乐部,新教徒和天主教徒